

匡亚明 主编

茅家琦等 著

孙中山评传 (中)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孙中山评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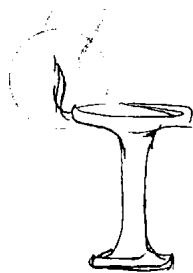
(中)

王康 著

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丛



王康 著



匡亚明 主编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孙中山评传 (中)

茅家琦等 著

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孙中山评传

第七章 在同盟会发动的 武装起义中的作用

(作者:时平副教授)

第一节 亲自主持制定《革命方略》 ——武装起义的指导文件

一、筹划全国的武装起义

同盟会成立后,革命党人陆续奔赴各省活动,尤以粤桂滇、两湖、江浙、赣皖等省最为活跃。

这时,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:过去,兴中会的成员以广东人为主,武装斗争的力量和地点都集中在广东;华兴会的成员以湖南籍为主,依托的力量和武装起义的筹划集中在湖南。现在,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,成员几乎遍及各省,如何展开武装起义,必须从全局通盘考虑武装起义的战略。

前文说过,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,孙中山与宫崎寅藏、平山周等人的笔谈中,提出了武装起义的“起点”问题。1905年7月下旬,孙中山同黄兴首次见面时就讨论了这一问题。宫崎寅藏记载:

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,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。……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,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。黄对孙说:“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不好。”孙说:“你要在长江一带干,但从哪里运送武器呢?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,你知道吗?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。”争来吵去,终于黄屈服了。^①

孙中山提出的选择两广作为武装起义起点的战略思想,为黄兴等革命党人所接受。1911年2月,黄兴给居正信中说:“吾党举事,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,以供输入武器之便。”^②说明孙、黄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。

孙中山这个战略,显然是承继他与宫崎等笔谈时阐述的中国武装起义起点的思想:“盖起点之地,不拘形势,总求急于聚人,利于接济,快于进取而矣。”除利于接济外,从当时急于聚人的群众基础来说,两广地区,尤其是广西呈现了令人鼓舞

^① 《宫崎滔天谈孙中山》,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:《孙中山史料专辑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,第316~317页。

^② 《黄兴致居正望在武汉结合新军响应革命函》,《黄克强先生全集》,第145页。



的形势。它成为引起孙、黄关注的重要原因。

广西从1902年起,连续爆发声势浩大的以游勇、会党为主力的群众武装起义,范围遍及全省,到1905年,起义才被清政府镇压下去。但不少起义队伍都撤退到山区或越南境内,经常向两广地区清军发动袭击。同时,这些武装力量与广西境内其他反清力量保持一定的联系。所以,对同盟会来讲,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现成武装力量。1905年7月28日,孙中山就指出:

方今两粤之间,民气强悍,会党充斥,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,而清兵不能平之,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。但其间人才太少,无一稍可为之人以主持之。去岁柳州之役,彼等闯关至香港招纳人才,时余在美国而无以应之也。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、主张之,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、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、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,一旦发难,立文明之政府,天下事从此定矣。^①

另外,驻扎广西的清军中有一定的革命基础。担任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、随营学堂总办蔡锷都表示同情革命,黄兴与二人素有交往;谭人凤、邹永成等也任职于随营学堂。“有这样多的革命党人云集在桂林,当时革命的空气非常紧张,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。”^②留日学生钮永建、秦毓鎏等也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276页。

② 《邹永成回忆录》,《近代史资料》,1956年第3期,第84页。



在广西龙州军界任职。因此,一旦同盟会发动起义,清政权内部响应的力量,广西基础较好。

再有,两广地处边陲,与越南毗邻。法国殖民当局中有一些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;越南不少华侨也支援和同情革命。同盟会可以越南为筹划起义的基地,向两广输送武器和人员。

1905年9月8日,同盟会本部成立不久,孙中山就派冯自由、李自重在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地联络同志。11月,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,加强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。10月7日,孙中山从横滨乘法轮“加利都尼亚”号亲赴越南筹划筹饷,胡毅生、邓慕汉、黎仲实和萱野长知同行。出发前,孙中山与法国驻越南总督滔美有联系,船抵上海吴淞口时,法国驻天津参谋长布加卑通过滔美介绍会晤孙中山。据胡毅生《记布加卑与吾党之关系》记载:布加卑声称是奉法国陆军大臣之命而来,询问革命势力的状况,并问各省军队的联络情况如何?如果真已成熟,法国政府愿意相助。孙中山认为没有把握。但同意调查,不久派一些同盟会员与法国军官一起分赴两广、西南和长江流域各省进行这项工作。

到西贡后,孙中山受到华侨各界人士的欢迎,广西会党重要首领王和顺也拜见孙中山,并加入了同盟会。王和顺入盟,对同盟会在两广边境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发挥重要作用。

孙中山在西贡停留一两天,去堤岸,成立同盟会分会,举侨商刘易初为会长、李卓峰为副会长,设立了通信机关。“自后西贡、堤岸两埠同志对于粤、桂、滇三省革命军事、均先后醞



以巨款,为他处侨商所不及。”^①孙中山还在河内、海防以办“兴学社”为名,组织革命力量;在西贡依托侨商,成立广东募债总局,发行债券,向侨商募集革命经费。1906年4月6日,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了新加坡同盟会分会,以陈楚楠、张永福为正副会长。一时间,新加坡成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活动中心。黄兴自1905年12月由香港潜入广西清军中奔波数月,多方联络,也于1906年春成立同盟会广西分会。经过孙、黄等人的努力,他们在香港、新加坡、河内、西贡等地建立起从事起义筹划和联络的机关;与广东、广西会党、驻扎的清军中少数军官建立了联系;并筹到一些起义经费。

4月17日,孙中山回日本。6月末7月初,孙中山偕胡汉民等再赴新加坡。8月7日抵吉隆坡,设立同盟会分会。9月26日,孙中山致函爪哇苏忠汉称:

目前至关重要是军费,一旦得此,即可随时发动驱除篡夺者的战争。然而军费唯有在爪哇等富庶地区始能筹集。你的工作是高尚的,而我国命运则取决于此工作的成败。请坚决进行,切勿迟疑。^②

10月9日,孙中山自西贡回到日本。同盟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,他多次离开日本,在外达9个月的时间,以主要精力和时间直接投入两广地区武装起义的筹划及准备工作。

^① 冯自由:《华侨开国革命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:《华侨与辛亥革命》,第39页。

^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294页。



二、制定武装起义的《革命方略》

各地同盟会组织建立,需要有一个具体指导全国武装起义的方略。1906年秋冬,孙中山亲自主持,与黄兴、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全国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——《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》。

这个方略由《军政府宣言》、《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》、《军队之编制》、《战士赏恤》、《军律》、《略地规则》、《因粮规则》、《安民布告》、《对外宣言》、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》、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》等11个文件组成。^①1908年增订本又增加了两个文件:《招军章程》和《招降清朝兵勇条件》。这个方略主要讲了两大问题:

(一) 阐述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

孙中山把同盟会的“十六字”革命纲领写入《革命方略》,阐述了民族与战争、民权与战争、民生与战争的关系;武装起义,建立革命军政府就是为了实现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建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。

孙中山认为:必须通过民族战争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: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。从“驱除”一面讲要采取暴力,从“恢复”一面说也离不开暴力。他强调“今军政府与我国民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大兵所至,举满洲政府不平等之政治,摧廓振荡,无俾遗孽”。^②他号召:“战士不爱其命,闾阎不惜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296~318页。

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317页。



其力，则革命可成，民政可立。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！”^①

（二）建立中华国民军的方案

孙中山在《革命方略》中制定了建立“中华国民军”的方案。它包括军事编制体制、军队纪律、战士赏恤条例、军需制度和瓦解敌军的俘虏政策等，初步形成了孙中山的建军思想。

在军队性质上，他指出：国民军是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，“以国民组织而成，……以主义集合，非以私人号召”，^②规定中华国民军的宗旨是同盟会“十六字”纲领。1908年孙中山把它正式定为军人誓词。显然，孙中山要建立的国民军是服务于国民革命的军队。

在军队与国民的关系上，孙中山指出：“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。”^③注意到进行国民革命过程中，军队与民众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。

在军队组织建设上，制定了军队的体制编制。包括各级军事单位的兵员和军官编制、各兵种编制、军阶定制、军饷定额、军队纪律条令、奖赏恤典等。国民军的体制编制是以清朝新军制度为模式制定的，根据革命的特点和需要进行了一定的改造，军事编制实际上仅限于标以下步兵各级编制。军队纪律共22条，包括军事作战和政治刑事两方面。要求全体国民军官兵听从“号令”，勇敢善战，维护和遵守军队纪律，保证军队的性质和战斗力，执行革命任务。

在《革命方略》中，孙中山还制定了《略地规则》和军队后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298页。

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311页。

③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297页。



勤保障措施。“略地”就是把清朝统治的地方,上至省会,下至州县,通过国民军的攻取,义民响应或敌军反正置于军政府控制和管辖之下;军队负责收缴敌人的军械粮草,查封府库官业、官印文书,释放囚犯,维护地方治安,“招集地方精壮编入军队”;^①同时军队注意选择军事要地,相机防守。

关于军需问题,规定国民军每军设因粮局,“专司因粮之事”。按“每日以十人养一兵”的标准,“凡军行所至之地,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驻军之多少”。^②规定军饷来源:一是把清朝官产和敌对之家产“充公”;二是给价收买“境内一切可应军用之货物”;三是向境内有财产者借用现银,并按财产数量抽收捐输;四是发行军事用票。在军队编制中,特别指出各级军事单位要配伙夫、挑夫,队设事务长,标有辎重队和医疗队,作为国民军战斗力的组成部分。

孙中山在《革命方略》中还制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,提出“凡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,若能顾念大义,翻然来归,军政府必推诚相与,视为一体”,“论功行赏”,“量才器使”。^③孙中山瓦解敌军的策略,主要是吸取历史上满洲政府“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”的教训,避免重演曾、左、胡、李等人助满“屠戮同胞”的悲剧。^④对瓦解敌军与削弱敌军战斗力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认识。指出: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305页。

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306页。

③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314、315页。

④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,第311、312页。



中国民族主义日明,人心之反正者日多,昔为我敌,今为我友,革命军之兴必无极强之抵力。^①

孙中山制定的《革命方略》,反映出孙中山初期的革命战争观和建军思想。《革命方略》制定后,在各省秘密流传,影响很大。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,许多方面就是按照《革命方略》去办的。

第二节 热情赞赏 1906 年的萍浏醴起义

一、萍浏醴起义的爆发

萍浏醴三县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,地处罗霄山脉北段。“山深箐密,道路分歧”,峰峦起伏,树竹茂盛,秘密会党非常活跃,拥有庞大的势力。“湖南之醴陵、浏阳,江西之萍乡、万载等县向为湘赣两省哥老会聚会之渊蔽。”^②

1906 年春,同盟会员刘道一和留日学生蔡绍南按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回到湖南。刘道一在长沙负责全盘筹划,和同盟会东京总部进行联系,蔡绍南首先前往萍乡联络会党。经过蔡绍南、魏宗铨的努力和多方奔走,终于将萍浏醴一带的各派会党力量联合起来,成立了六龙山洪江会,推举龚春台为大哥。组织形式是会党习惯的形式,首领们确立了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,一定程度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和政治主张。有些

^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1 卷,第 292 页。

^② 冯自由: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中卷,第 51 页。



会党,如洪福会仍保持其特点,并没有真正接受同盟会的政纲,而是在反对满清旗帜下进行合作。

洪江会大哥龚春台“称奉孙中山先生命,组织机关,以备驱策”。“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,下分文案、钱库、总管、训练、交通、武库、巡查为内八堂,各司职务。又设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路码头官,为外八堂,号召同志入会。下则红旗、跑风各职。”在萍乡上栗市设有接待会友和筹集经费的机关,在萍浏醴连界的麻石设立活动机构。布置就绪后,各路码头分别活动,发展会员。“入会者先由红旗介绍,经码头官许可,再由码头官监视举行入会仪式,宣誓:‘誓遵中华民国宗旨,服从大哥命令,同心同德,灭满兴汉,如渝此盟,人神共殛’。”^①洪江会形式上接受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、同盟会的封号和政治主张,但其组织形式、活动方法和主要一些口号等都保持会党的固有形式和习惯。

洪福会起义时自称“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军”,檄文内容与洪江会发表的檄文有显著差别,仍然是反清复明,恢复汉族统治的主张。

刘道一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战略,在长沙召集龚春台、蒋翊武、刘重等人参加的会议,传达黄兴的指示:

革命军发难,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,否则亦必会党发难,军队急为响应之,以会党缺乏器械,且少军队训练,难于持久故也。……今欲规取省

^① 《魏宗铨传》,见邹鲁: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第5册,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,第1277页。



城，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，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，方可举事。现时会党，多潜伏于萍乡安源诸矿山上，正可利用矿场等处，为组合机关。……姑就次策言之，使以会党万人，组成整齐军队，发难于浏醴，而直扑长沙，各军队能反戈相应，占据省垣重地，军装局既为我有，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。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，为便衣敢死队，以手枪炸弹扰乱外来敌军后方。而黄公及吾兄等，又正在运动鄂赣宁各省，乘时响应，届时自必归来，主持一切，可无失败之虞。^①

与会者基本接受了这个意见，研究了起义方案。9月初，蔡绍南、魏宗铨赴上海与同盟会宁调元、李发群取得联系，“发群乃介绍其人同盟会，并予以往东京同盟会本部之介绍函”。^②他们准备赴日之际，接到龚春台急信，知情况有变，迅速返回湖南。10月初，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的清政府官员知悉，开始采取行动，缉拿捕杀会党头目。随后，浏阳、醴陵清军也采取追剿行动。到11月下旬，客观形势越来越紧，于是，12月2日龚春台、蔡绍南等召集各路首领会议商讨对策。会上意见不统一，廖叔保不听号令，在麻石聚众起义。这样，在思想尚未统一，准备还没完成的情况下，龚春台向各处会友宣布起义，把高家台所藏军械分发各部。12月4日，萍浏醴起

① 刘揆一：《黄兴传记》，《辛亥革命》资料丛刊（四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85页。

② 《邹永成回忆录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，1956年第3期，第88页。



义正式爆发。

12月8日至12日,各地会党纷纷响应,起义军达3万多人,“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”,由龚春台任都督,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,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;“新中华大帝国南部恢复军”,由姜守旦任都督。各支起义军分别发表檄文。起义军在湘赣边境迅速扩展,控制了江西萍乡、宜春、万载和湖南浏阳、醴陵五县,先头部队推进湘潭境内。12月13日,清政府电令张之洞、端方、岑春煊合力围攻义军,在清军重兵的镇压下,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,经过半个月的奋战,终于失败了。

二、孙中山采取的行动,对起义的评价

萍浏醴起义突然爆发,在日本的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在此之前,以及爆发后的几日,均没有得到消息。从目前掌握的资料,12月12日上午,孙中山知道萍浏醴起义的消息。日本东京报纸于12日首次报道起义的消息。孙中山和东京的同盟会员得悉这个消息后,非常振奋,与黄兴立即行动,派出一批同盟会骨干赶回国内,准备加强对义军的支援,扩大起义成果。但是,已经迟了。冯自由回忆说:

丙午十月萍浏一役,本无谋定后动之具体组织,故革命党东京本部事前并未与闻。及既发动,本部始先后派孙毓筠、杨卓林、权道涵、段灏、廖德磻、李发根、胡瑛、宁调元等,分赴苏、皖、浙、湘、鄂各省运动起事,为萍、浏、醴义军之声援。而上海党员刘震、



黎兆梅、滕元寿等复联络长江一带会党……密谋在南京起事，诘事机不密，各种计划均为虏督端方所破。除刘道一、宁调元、胡瑛等在湘、鄂被逮之外，孙、杨、权、段诸人相继就擒，鲜有幸免者。^①

12月31日，刘道一在长沙被杀害。孙中山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。1907年1月5日，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，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活动。孙中山认为：

自去年秋江西省萍乡之乱发生，风云忽急，全国震荡。湖南、曾州、江阴、东阿、辽河以西等地接踵响应，到处箪食壶浆，以迎革命赤旗。……如不乘此时机起事，我党又何时能如陈、吴之救国！不惜牺牲，我志已决。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，联络声气，立刻举事。可使广东省罗定府的志士为前锋，他们与当地镇台的将弁等密结盟约，不战即可据有广东省城，现在只待领导者的号令下达。因此，黄兴君将先期代表我中国革命同盟会，乘搭十一日自横滨启程的便船，匆匆赴会，并可得汪兆铭君同行。

请君作为见证人前往。我希望你将亲身见闻，自始至终，笔之于书。……务将天下人有所误解之处，为我革命志士阐明，并使他们的值得赞颂地方为世所知。^②

①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6集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08页。

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332~333页。

